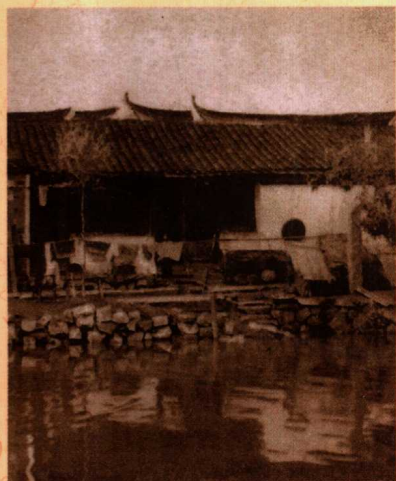




名家名著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 著

江村经济



刘豪兴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村经济/费孝通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名家名著)

ISBN 7-208-06216-1

I. 江... II. 费... III. ①农民-生活-社会调查-吴江市
②农民-生活-社会调查-大理市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450 号

责任编辑 陆宗寅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名家名著 ·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9.5 插页 4 字数 451,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6216-1/C·229

定价 42.00 元

目 录

江村经济/ 1

序 布·马林诺斯基/ 3

第一章 前言/ 9

第二章 调查区域/ 12

第三章 家/ 27

第四章 财产与继承/ 45

第五章 亲属关系的扩展/ 61

第六章 户与村/ 68

第七章 生活/ 81

第八章 职业分化/ 95

第九章 劳作日程/ 100

第十章 农业/ 108

第十一章 土地的占有/ 121

第十二章 蚕丝业/ 135

第十三章 养羊与贩卖/ 158

第十四章 贸易/ 161

第十五章 资金/ 176

第十六章 中国的土地问题/ 187

附录 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 190

附录一 江村通讯/ 199

附录二 留英记/217

附录三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241

禄村农田/271

导言/273

第一章 农作/278

第二章 劳力的利用/293

第三章 农田的负担/305

第四章 农田分配/317

第五章 劳力的出卖/324

第六章 自营和雇工/333

第七章 租营/345

第八章 生计/355

第九章 生计(续)/375

第十章 农田的继袭/391

第十一章 农村金融/400

第十二章 农田买卖/407

附录一 《云南三村》序/420

附录二 《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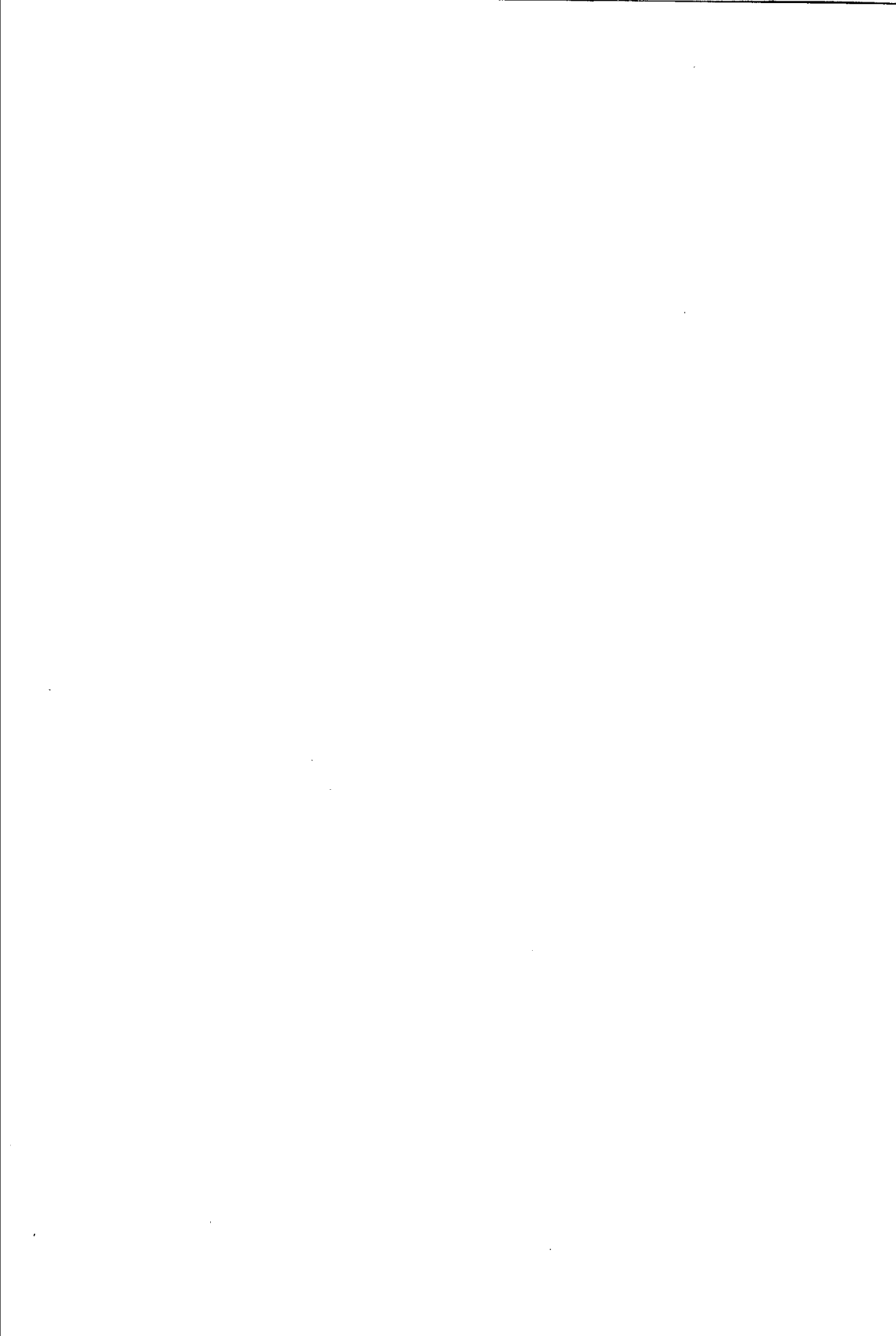
编后语/461

江村经济^{*}

——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

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 1936 年的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1939 年由英国伦敦 Routledge 书局出版,书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文名《江村经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作者委托戴可景翻译成中文,198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后附录了作者《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两文,以及澳大利亚人类学家 W·葛迪斯 1956 年访问江村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作者在《江村经济》出版座谈会上献诗一首,诗曰:“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岁月春水逝,老来羨夕阳。合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编者



序

布·马林诺斯基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

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博士清晰地看到,纵然有最好的意图和理想的目的,如果一开始对变化的环境有错误的理解和看法,那么,计划也必定是错误的。“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我感到,还必须引述前言中的一段话,“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学者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最大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在机械工程中,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不顾科学的物理和数学而作出规划、设计或计算,故在政治行动中同样需要充分发挥理智和经验的作用。

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我们只注意在机械工程中用最合格的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力量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越来越依从于疯子、狂人和歹徒。在界线的一边正越来越多地责备着那种个人随心所欲,毫无责任感或毫无恪守信义的道德义务的倾向,而在另一边我们尽管仍然可以在财富、权力和实力上具有压倒的优势,近数年来却始终不断地暴露出软弱、涣散以及对荣誉所负的神圣义务的忽视。

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虽然这也许是表面上的,实际并不如此。但我的自白无疑是真实的,我说过“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然而补救办法近在咫尺,如果允许我再引述我的一些其他看法的话,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

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本书以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广泛的工作,证实了我的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这一段引语中还包含着对现代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基本要求: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

因此,约两年前,当我接待了燕京大学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来访,感到极大的欣慰,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吴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国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它,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怎样思考的。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的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

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本来的主要题材是对湖泽地带的平原乡村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那水道纵横的平原是数千年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抚育中国人民的地方。不言而喻,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农业文化基础。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在本书中,费博士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我知道,他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在村庄和城镇

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①

序言作者的任务并不是再来复述一番本书已经动人地描述过的内容。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 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 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地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我已得到允许,引述 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了该书手稿以后的一段话,他阐明了该书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这里所说的“好奇的陌生人”就是丹尼森·罗斯爵士,他恰是一个科学家、历史学家和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

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它提出了一些附带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另一些研究的起点。

① 已经完成的作品,大多用中文写成,有下列诸题:《山东邹平的贸易系统》,杨庆堃著;《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徐雍舜著;《河北农民的风俗》,黄石著;《福州的族村》,林耀华著;《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廖泰初著;《花蓝瑶社会组织》,费博士及夫人著。正在进行研究的有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及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



作者和农村姑娘

在这一章和其他很多章节的论据中,我们能够发现著者的道德品质,请允许我强调提出这一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有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这样一种公开批评政府不当行为的社会学工作,现在仍然进行着,想必得到政府的鼓励,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正直和团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官方的明智。

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

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看来中国人是能够区别民族和政治制度的。日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他们对它甚至不怀仇恨。在本书第一页上,作者提到这个侵略国,冷静地评价它的作用在于迫使中国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并调整它的某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巩固了中国。我们所了解、评价,甚至逐渐依恋的那个村庄,现在可能已被破坏。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1938年10月15日于伦敦大学人类学系

第一章 前 言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

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我们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对任何一方面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描述中所看到的，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

以,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事实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所以,新工具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不适合于人们的目的。

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变革是更加困难了。当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替代它的其他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得起来的。另外,社会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一个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所以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为组织集体行动,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 and 定义以及一个系统的计划。这种准备活动一般都需要一种语言形式。最简单的形式如一个船长在指挥一条船航行时,对他的船员们发出命令。又如在议会或国会里进行一场有准备的辩论。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同解释和关于结果的各种期望形成辩论的中心。无论如何,这样的准备活动总是会在有组织的革新活动中出现的。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本书有许多例子说明了对情况或形势的实事求是的阐述或分析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先提几个例子:在亲属组织中,目前法律对财产继承问题的规定似已成为两性不平等的实例。一旦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接受,这样的规定将产生一种修改单方亲属原则的行动。正如我要说明的,财产的继承是两代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供养老人的义务,落在子女身上的社会里。在目前父居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儿和儿子不能分担同等的义务。因此,双系继承与单方立嗣相结合将形成两性的不平等。从这一点来看,立法的后果显然与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四章六节)。

有时,对情况或形势的阐明或分析可能是正确的,但不完整。例如,在缫丝工业中,改革者主要从技术方面来分析情况,忽略了在丝价下降中国际贸易的因素,这就导致多年来,对村民许下的从工业中增加

收入的诺言,未能实现(十一章八节)。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中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群懂得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的初步尝试。在福建、山东、山西、河北和广西都开展了同样的研究。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组织得更好的力量,继续进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这本不成熟的书拿出来,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日本人占领并破坏了我所描述的村庄,我被剥夺了在近期做进一步的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把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还会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第二章 调查区域

一、调查区域的界定

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A. 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吴文藻博士和雷蒙德·弗思博士^①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研究的最初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弗思博士说,应当“以一个村作研究中心来考察这村居民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这样一个村庄并没有正式进入保甲制。保甲制是中国的一种新的

① A. 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教授于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就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作了讲演;接着,吴文藻博士在天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周刊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来,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在《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的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此文刊登在《社会学界》第10卷中。